

非洲研究文库·非洲发展研究系列

总编◎刘鸿武

Indigenous Knowledge in Africa's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非洲发展视域中 的本土知识

张永宏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非洲研究文库·非洲

总编◎刘军

Indigenous Knowledge in Africa's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非洲发展视域中 的本土知识

张永宏◎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非洲发展视域中的本土知识/张永宏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3

ISBN 978-7-5004-8564-3

I. ①非… II. ①张… III. ①高等教育—研究—非洲 IV. ①G649.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4574 号

责任编辑 张 林
特约编辑 张冬梅
责任校对 郭 娟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君升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8.25 插 页 2

字 数 308 千字

定 价 3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深入了解非洲 增进中非友好

——《非洲研究文库》总序

非洲是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地域广阔，物产丰富，历史文化悠久，人口约 10 亿，共有 53 个独立国家和 1500 多个民族，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近年来，非洲局势发展总体平稳，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一体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国际社会对非洲的关注和投入不断增加，非洲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中国是非洲国家的好朋友、好伙伴，中非传统友谊源远流长。早在 2000 多年前的汉朝时期，中非双方就互有了解并开始间接贸易往来。1405～1433 年，明朝航海家郑和率船队七次下西洋，其中四次到达东非沿岸，至今肯尼亚等国还流传着郑和下西洋的故事。1949 年新中国成立开辟了中非关系新纪元。1956 年 5 月，中国同埃及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非洲国家的外交关系。中国曾大力支持非洲人民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在非洲国家赢得独立后，中国坚定地支持非洲国家维护主权和尊严，真诚无私地帮助非洲国家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赢得了非洲朋友的尊重和信任。中非友谊经受住了时间和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与日俱增。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中非双方领导人的共同关心和亲自推动下，中非关系在传统友好的基础上呈现新的全面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2000 年 10 月，中非合作论坛正式成立并召开首届部长级会议，这在中非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此后论坛逐步发展成为中非集体对话的重要平台和务实合作的有效机制。在 2004 年和 2006 年，胡锦涛主席两次访非，同非洲领导人

就新形势下进一步发展中非关系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了广泛共识。2006年初，中国政府发表《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将“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互利互惠，共同繁荣；相互支持，密切配合；相互学习，共谋发展”确定为新时期中国对非政策的总体原则和目标，受到非洲国家的普遍赞赏和欢迎。

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暨第三届部长级会议成功举行，中非领导人共同确立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胡锦涛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了加强中非务实合作、支持非洲国家发展的八项政策措施，中非关系由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07年初，胡锦涛主席专程访问非洲，全面启动北京峰会后续行动的落实。2009年2月，胡锦涛主席再次访问非洲，进一步巩固了中非传统友谊，拓展了双方务实合作领域，有力推动了北京峰会各项成果的全面落实。在短短的八年时间里，中非经贸合作取得跨越式发展，中非贸易额从2000年首次突破100亿美元升至2008年的1068亿美元，提前两年实现了1000亿美元的目标。同时中非在文化、科技、金融、民航、旅游等领域的合作也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随着中非关系的蓬勃发展，中国社会各界深入了解非洲与中非关系的兴趣和需求逐年上升，这对国内从事非洲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在此背景下，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主持编撰的大型非洲研究丛书《非洲研究文库》应运而生。《非洲研究文库》由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按照“学科建设和社会需求并重”、“学术追求与现实应用兼顾”的原则，遴选非洲研究领域的重点课题，分为《非洲发展研究系列》、《中非关系研究系列》、《非洲国际关系研究系列》、《非洲研究博士论文系列》、《非洲高等教育国别研究系列》、《非洲专题史系列》、《非洲国别史系列》、《非洲研究译丛系列》等八个系列逐步编撰出版，集学术性和知识性于一体，力求客观地反映非洲历史和现实，是一项学科覆盖面广、具有鲜明特色的非洲基础研究成果。这套丛书致力于研究非洲问题和中非关系提供详尽的史料和新颖的视角，有利于增进各界对非洲的深入了解和认识。丛书第一册《全球视野下的达尔富尔问题研究》于2008年10月问世后社会反响良好，该书对全面客观地了解达尔富尔问题和中国对非洲外交具有积极意义。

《非洲研究文库》的推出离不开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专家和学

者的辛勤工作。浙江师范大学开展对非洲研究工作已有十多年历史，取得了不少成果，2007年9月，该校正式成立非洲研究院，它是国内高校中首家综合性非洲研究院，设有非洲政治与国际关系、非洲经济、非洲教育、非洲历史文化四个研究所，以及非洲图书资料中心、非洲艺术传媒制作中心和非洲博物馆，是教育部教育援非基地，在喀麦隆建有孔子学院，为推动中国的非洲问题研究和促进中非关系、文化交流与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本人从事对非外交工作多年，对非洲大陆和非洲人民怀有深厚感情。我得知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合作推出《非洲研究文库》系列丛书，甚是欣慰。我为越来越多的国人将通过丛书进一步了解非洲和中非关系，进而为中非友好事业添砖加瓦感到振奋；我也为中国学者在非洲和中非关系研究领域取得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成果感到高兴。我相信，《非洲研究文库》系列丛书的出版，将推动国内对非洲和中非关系的研究更上一层楼。谨此作序，以表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助理 翟隽

2009年2月于北京

前 言

非洲大陆地域辽阔，文明悠久，民族众多，发展潜力巨大。中国与非洲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生了质的飞跃。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与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国内各行各业都产生了走进非洲、认识非洲、了解非洲的广泛需要。加强对非洲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科技教育、中非关系等各方面的研究，培养相关专业人才，已经显得日益重要。

浙江省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改革开放 30 年来，浙江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日趋紧密，已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省份。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有一批批浙江人远赴非洲闯市场，寻商机。如今在广袤非洲大陆的城市与乡村，都可以找到浙江人辛劳创业的身影。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非洲人来到浙江经商贸易，寻求发展机会。

世纪之交，基于主动服务国家外交战略、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学校特色学科建设的需要，浙江师范大学努力发挥自身优势，凝炼办学特色，积极开展对非工作，在汉语国际推广、人力资源开发与非洲学术研究三个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产生了广泛影响。1996 年，受国家教委派遣，我校在喀麦隆雅温德第二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建立了“喀麦隆汉语教学中心”，十多年来，已有 1000 多人在该中心学习汉语与中国文化，其中外交官和研究生达 500 多名，学生遍及非洲近 20 个国家。该中心在非洲诸多国家已声名远播，被喀麦隆政府及周边国家赞誉为“体现南南合作精神的典范”。2005 年，为表彰中国教师在传播汉语言文化、发展中喀友谊方面所做的特殊贡献，喀麦隆政府授予我校三位教师“喀麦隆金质劳动勋章”。

2007年11月,该中心发展为雅温德第二大学孔子学院和汉语水平考试(HSK)考点。2007年胡锦涛主席访问喀麦隆期间,中喀两国元首共同做出了合作建设孔子学院的决定。同年11月9日,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副组长陈进玉率团赴喀举行隆重的孔子学院揭牌仪式,由此掀开了中喀文化教育交流新的一页。

从2002年开始,我校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框架下,在教育部国际司和商务部援外司的具体指导下,积极承担教育部和商务部的人力资源开发项目,邀请非洲各国高级教育官员和大学校长到中国研修。迄今为止,我校已举办13期非洲高级教育官员研修班,有42个非洲国家的240余名大、中学校长和高级教育官员参加了研修。2004年,我校成为教育部4个教育援外基地之一。2006年,我校承办国家教育部“首届中非大学校长论坛”,来自14个非洲国家的30名非洲大学校长、高级教育行政官员以及国内几十所高校的校长、学者和部分教育行政官员参加了会议。此外,我校还于2009年5月承办了教育部第七次对发展中国家教育援助工作会议。

在积极开展汉语国际推广、人力资源开发的同时,我校审时度势,抓住机遇,迅速启动了非洲研究与学科建设。2003年,我校成立了国内首家专门研究非洲教育及发展的学术机构——非洲教育研究中心,由时任校长的徐辉教授兼任主任。随后,中心承担了国家教育部、国家留学基金委支持的《非洲高等教育国别研究工程》项目,派遣14人分赴非洲7个国家进行实地调研。几年来,学校还承担了多项国家汉办对非汉语推广研究课题,并向教育部提交了多个有关中非教育合作的政策咨询报告。

2007年9月1日,经多方论证,精心筹划,我校与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联合共建,成立了国内首家综合性的非洲研究院——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由时任校长的梅新林教授兼任院长,刘鸿武教授任执行院长,顾建新教授任副院长。期间,我校还主办了《面向21世纪的中非合作:战略与途径》国际学术会议。非洲研究院的成立,标志着我校对非工作进入了一个非洲学术研究、对非汉语推广、对非人力资源开发培训三位一体而重点向非洲学科建设迈进的崭新历史阶段。

浙江师范大学成立非洲研究院的学术宗旨是主动服务国家外交战略、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服务学校学科发展。其发展目标是以“非洲情怀、中国特色、全球视野”的治学精神,构建一个开放的学术平台,聚集国内外非洲学者及有志于非洲研究的后起之秀,开展长期而系统的非洲研究工

作,通过若干年持续不断的努力,使其成为国内一流、有国际影响力的非洲人才培养基地、学术研究中心、决策咨询中心和信息服务中心,以学术服务国家,为中非关系发展作出贡献。

非洲研究院集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国际交流、政策咨询等为一体,设有非洲政治与国际关系、非洲经济、非洲教育、非洲历史文化4个研究所,以及非洲图书资料中心、非洲博物馆、非洲艺术传媒制作中心,现有专职人员25人。他们的研究成果曾获国家领导人嘉奖,有的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教育部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全国高校优秀教材奖、省政府特殊津贴奖,年轻科研人员多为毕业于国内名牌大学的博士,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并有志于非洲研究事业。研究院还聘请了一批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担任顾问、客座教授和兼职研究员。

非洲研究院成立一年多来,工作成效显著,获得浙江省政府“钱江学者”特聘教授岗位,组建起一支以省特聘教授、著名非洲研究专家刘鸿武教授为学科带头人的非洲研究团队,先后承担国家外交部、中联部、教育部、国家社科基金、国务院侨办等部门一系列重要研究课题与调研报告项目,出版发表了包括《全球视野下的达尔富尔问题研究》等一批有学术影响力的成果。2008年,非洲研究院被国家留学基金委列为与非洲国家互换奖学金项目单位后,开始启动“非洲通人才培养计划”,一批青年科研人员与研究生被选派至非洲国家的大学进修学习。2009年,刘鸿武教授主持的课题《新时期中非合作关系研究》获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标志我校非洲研究跃上了新的学术平台。同年,非洲研究成为浙江省高校省级创新团队。在浙江省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的支持下,非洲研究院列入浙江省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省院共建重点学科行列,并与该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开展了很好的合作,与非洲及欧美国家非洲研究机构的学术交流也日益频繁。

我校的对非工作与非洲研究,得到了国家有关部委、学术组织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省委省政府、国家留学基金委、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等领导相继莅临视察,指导工作;外交部非洲司、政策规划司、中联部非洲局、教育部社科司、国际司、商务部援外司、国家汉办以及外交学院、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有关领导

和专家先后来我校非洲研究院指导发展规划、建设思路及科研工作；浙江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外事办、省社科院、省社科联等部门领导与专家也对研究院给予了多方面的帮助和指导，有力地推动了我校对非工作与非洲研究的顺利开展。

编纂《非洲研究文库》是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长期开展的一项基础性学术工作，由相关部门领导与著名学者组成编纂委员会，以“学科建设与社会需求并重”、“学术追求与现实应用兼顾”为基本原则，遴选非洲研究重大领域及重点课题，以国别和专题研究之形式，集合为八大系列的大型丛书，分期分批出版，以期形成既有学科覆盖面与系统性，同时又具鲜明特色的基础性、标志性研究成果。值此《文库》即将出版之际，谨向所有给予研究院热忱指导和鼎力支持的有关部门，应邀担任《文库》顾问与编委的领导与专家，为《文库》撰写《总序》的外交部部长助理翟隽先生，以及出版《文库》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的非洲研究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现在已经具有初步的基础，目前国家高度重视非洲研究和人才培养，国内已有多所大学建立了非洲研究的学术机构。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与各相关单位开展更有效的合作，共同努力，为中国非洲学的发展贡献力量。

浙江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梅新林

浙江师范大学校长 吴锋民

2009年5月

序一：全球视野与中国的非洲研究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刘鸿武教授组织和主编的《非洲研究文库》出版问世，这是一个让我们所有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人有所期待和可能受益的宏大项目。在此，我要向鸿武和所有为此作出努力的同行表示由衷的敬意和祝贺！

我自己不是非洲问题研究者，去过的非洲国家也很少，但我一直觉得，我们过去的非洲研究对整个国际问题研究的影响不够大，至少在我作为编辑看到的稿件和作为研究者接触到的有关部门及媒体，留有这样一种印象。它多少让人遗憾。

非洲国家数目占据当今全球总数的近三分之一，这个大陆无论自然资源还是地理区位都具有其他各大洲不具备的一些优势；非洲各国总体上对华友好（用毛泽东的话“是非洲兄弟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现在双方互利互补的地方广泛且重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日益活跃与世界性作用的上升，离不开中非关系的拓展与深化。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有关“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新殖民主义论”等等非议甚嚣尘上，其中相当一部分涉及新时期的中非关系，涉及中国在非洲的存在，涉及中国的非洲战略。不管从什么角度讲，一种设计全面且高瞻远瞩、形态多样且影响重大的中国非洲学都是急需的。

最近几年里，由于工作上的原因，我与鸿武教授本人及他的非洲研究团队有过多次接触，在这一过程中，不仅看到他们的大量新作及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看到浙江师范大学领导和各个方面对他们的大力支持与协助，更看到贯彻其中的一种新气象新视野，一种洞察中国外交全局之后开展非洲研究的大气，一种只有立足于全球层次和中非宏观战略关系才会具

备的视野。虽然这个团队本身还有许多要加强的地方，它的朝气与追求未必代表中国的非洲研究的全貌，但“愚公移山”和“星火燎原”的故事是我们都熟悉的，刘鸿武教授及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的前景是美好的。在我看来，《非洲研究文库》便是这个神奇故事的一小段，是中国非洲学界新长征之征途的又一步。

中国外交已站在新的全球高地上，人们有理由期待，中国的非洲学同样朝着新的层次迈进。

王逸舟

2009年8月18日写于北京

序二：非洲研究——中国学术的“新边疆”

由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永宏教授完成的新著《本土知识与非洲发展问题》即将出版，这是一本从非洲内部的本土知识视角探究当代非洲发展问题的新著。作者立意新颖，眼光独到，是对当代非洲发展问题的一种新探索，颇具学术探究精神与现实关注情怀。因本项研究是在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部分内容的基础上加以拓展、深化、完善而成，作为作者的博士生导师，我对此项研究一直很关注，也很支持。现应作者之约，以我对此书所知之范畴，就本书所努力拓展的非洲发展研究的新境界、新领域，略陈本人看法，以当序文。

学术研究与时环境往往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中国古人主张“知人论世”，认为要知晓其所论所思为何如此，要理解其人学术与思想之特点个性，不能不考察辨析他的生活时代，不能不联系他的人生经历与治学环境。所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学术，时代条件与环境因素总在某种或隐或显的形态下制约着、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过程。

过去百年中国学术之成长与变革进程，深深地印刻着时代的痕迹。因为20世纪中华文明追求现代复兴与发展任务的紧迫与艰难，更因中华学术经世致用传统之影响，中国学术过去百年的成长过程，始终紧紧围绕着、服务着中华文明复兴与发展的当下急迫之需。摆脱落后、追求先进的时代使命，使得现代中国学术的目光多紧盯那先进于我之国家民族，于是，“西洋学术”、“欧美文化”，乃至“东洋变法”、“俄苏革命”，都曾以

不同之方式，进入中国学术的中心地带，成为过去百年中国学人热情关注、努力移植、潜心研究之重心与焦点，各种形式的“言必称希腊”成为中国学术一时之现象，也便自有其合乎时代环境与存在之缘由了。而在此背景下，对于遥远他乡那些看似与当下国家复兴发展关涉不大或联系不紧的学问领域，对于那些与中国一样落后于世的落后地区、不发达国家、弱小民族的研究，人们便一直关注不多，问津甚少。

于是，在相当长的时期中，非洲大陆这样一个相对落后且距中国遥远的世界，便成为中国现代学术世界中的一块“遥远边疆”，一片“清冷边地”。偶尔会有探险者、好奇者、过路者进入其间，于其风光景致窥得一角，但终因天遥地远，梁河相隔而舟渡难寻。直至今日，非洲研究这一领域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依然还是“化外之地”，至多，也仅仅是一块供人们发挥想象力的遥远他乡。

而在西方学术界，非洲研究却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如果加上早期殖民探险者、传教士留下的那些并不太专业的探险游记、传教回忆录、考察报告，西方人对非洲大陆的认知与研究，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三四百年前。事实上，西方现代学术的诸多领域，诸如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考古学、人种学、生态学等等，各种流行一时的理论或流派，诸如结构主义、功能主义、传播理论、发展研究、现代化理论、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世界体系论等等，都曾以不同的方式或形态，与非洲这块大陆有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关联。直至今日，在非洲大陆各地，依然时常可以见到有西方学者潜心考察、调研与研究的踪迹。

不过，近些年来，非洲研究似乎也开始逐渐地成为当代中国学术领域中一片日见获得拓展的“新边疆”，一块彰显当代中国学术视野的拓展、学术气质变化的新兴领域。一些具有学术敏锐性的人们发现，非洲这块大陆不仅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发展潜力，仅就对当代中国学术来说，非洲研究领域也有丰富的矿藏有待挖掘，有大片的处女地值得开垦。事实上，在全球化进程快速推进、中国与外部世界日益融为一体而中国也在努力追求自己的大国强国地位的今日，非洲研究这一“学术新边疆”之探测与开垦，对中国学术现代品质之锻造——诸如全球视野之拓展，普世情怀之建构，主体意识之觉醒，中国特色之形成，等等，都可能具有特殊的增益作用。

中华民族历来有关注天下、往来四海之开放传统，有民吾同胞、物我

与也的普世情怀。在其漫长的文明演进史上,中华民族一直在努力突破地域之限制而与外部世界建立接触与交往,由此扩展着自己的视野,丰富自身的形态,并从中获得更新发展之动力。这种努力自进入近代以后,尤为强烈与明显。虽然因时代条件之制约而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学术主要关注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但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中华民族追求现代复兴并因此而努力与外部世界建立新型关系的过程中,也开始与遥远的非洲大陆建立日益紧密的文化对话与交流合作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建立,尽管在初期规模尚小,但从长远来看,它对于中华古老文化在当代之复兴与发展,对于东方形态的中华文化在承继传统的过程中同时转变为日益具有开放性质与全球形态的世界性文化,是有某种特殊的指向未来的象征意义。^①

我们认为,非洲研究开始为中国学术界所重视这一变化的到来,是有深刻的时代背景与象征意义的,它其实折射出中华文化的现代复兴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华文明现代复兴的形态与方式也正在变化之中。^②就此来说,读者现在看到的这套《非洲研究文库》,或许正可以成为透视这一变化的一个小小的窗口。我们希望,在未来的年代,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学子进入这一“遥远”领域,以中华学术之慧眼识得异域他乡之风光,捡回新奇多样之珍珠,用以丰富现代中国之学术殿堂。

二

当代非洲数十个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是当代人类面临的最为复杂的难题之一,它足以为来自众多学科领域的学者们提供最具挑战性的研究课题,验证其理论的解释能力与实践意义。在过去数十年间,围绕着当代非洲发展问题而形成的理论与政策主张,在世界各国争鸣不已,可谓是流派纷呈,形态各异,各家各派攻伐论战,难得共识。但是,经数十年之理论争议与实践尝试,人们现在大体上得出一个共识,即非洲的发展虽然应

^① 刘鸿武:《跨越大洋的遥远呼应——中非两大文明之历史认知与现代合作》,《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5页。

^② 参见刘鸿武《当代中非关系与亚非文明复兴浪潮——关于当代中非关系特殊性质及意义的若干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9期,第29~37页。

该得到国际社会的援助，需要有一个更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与条件，但从根本上说，非洲的发展问题最终还是只能从非洲内部、由非洲人民通过自己的意愿和努力加以解决。任何完美之理论模式与发展计划，任何善意之政策主张与援助方案，若要能在非洲取得成效，它终究须基于非洲社会之本土实际，必须经由非洲人民自己的努力而转化成一种本土性发展（Indigtnous Development）与内源性发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之动力。本土知识的价值重估与利用，就是在此背景下进入当代非洲发展问题研究的视阈中来的。

“本土知识”（Indigtnous Knowledge），亦有称为地方知识（Local Knowledge）、传统知识（Traditional Knowledge），一般是指世界各国各地区之人民在其生活之土地上自己创造发明、并经由以往时代传承下来而迄今依然具有生命力和价值的地方性知识。在任何社会中，本土知识皆涉及当代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一国一地人民之物质生活的完善与精神生活的提升，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因为在这些知识背后，还有当地人民的独特智慧与内心情感，有维系这些知识并使其发挥功能的该社会之制度设计、价值体系和民族精神，它让本土的人民获得生命的意义感和归属感，产生激发其创造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本土知识虽然产生于传统之时代，但它的价值与意义在现代社会重新受到普遍重视，却是人类对现代化社会之弊端与缺陷加以反思的一种现代性努力，人们试图在现代科学与本土知识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消除发展中国家二元社会结构之对立。因此，对本土知识的价值重估正反映出人类在面向 21 世纪时一种更为智慧也更为平等的发展努力。^①

不过，本土知识产生于不同之自然环境下，其文化背景与人文特征亦各有不同，因而长期以来，关于本土知识之确切定义、功能与作用，一直多有争议。作为一个参照系，与“本土知识”相对应者，是指近代以来经由科学技术革命而最先在西方兴起并进而扩散于世界各地的“科学知识”（或“现代知识”）。但大体上说来，所谓本土知识，多是那些与特定之文化或社会相联系的独特知识。与那些源自大学、研究机构的具有普适性或国际性的理论性知识不同，本土知识是本地社会、本土人民的创造，是本土人民生存的基础。

^①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 年第 9 期，第 29～37 页。

事实上，关于本土知识的定义，是在对本土知识之价值的不断发现和重视认识过程中展开的。近年来，关于本土知识的价值与意义，越来越多地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本土知识的价值边界似乎正在拓展，从解决贫困、疾病问题到资源的有效利用与保护，从对发展的反思到全球环境治理、可持续发展，从与科技的对立到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借鉴，从去殖民化到国家建构，等等，本土知识的价值与意义似乎无所不在，为人们广为关注。但另一方面，本土知识也面临着普遍的被忽视与受压制的困境，甚至有人认为，在现代科技主导的全球化时代，本土知识必将走向消亡或终结。

然而，自人猿揖别始，知识就是人类养活自己、维护健康、相互交流、理解环境、应对挑战的根本性手段。从人类历史发展看，近现代科技的出现，只不过是十分晚近的现象。虽然，近现代科技使人类社会能养活越来越多的人，治愈各种各样的疾病，改善卫生状况，实现全球范围内的便捷通讯，支撑全球一体化市场的复杂运行，等等。但是，人类依然面临着很多苦难和危机，如贫困加剧、疾病流行，资源耗竭、环境恶化，族群冲突、宗教对抗，财富不均和机会不等，等等。对这些问题的长期探索的结果表明，科技不可能独立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现代科技知识与本土知识的相互尊重与借鉴，逐渐受到广泛重视。

从非洲的实践来看，本土知识是当代非洲发展进程中必不可少的有效知识。一些非洲国家本土知识应用的成功案例表明，本土知识在非洲减贫、提供初级护理、防止冲突、管理自然资源和当地事务、应对全球化负面影响、促进健康、财富分享等方面，都扮演着特殊的角色。特别是对贫困人群和贫困社区，本土知识是其发展的几乎唯一的资本，是本土人民最重要的人权、财富和机会，因此，非洲的扶贫开发应系统考虑本土知识的特殊性作用。

探索当代非洲国家的发展问题，必须要有适当的思维转换与路径选择。我们应该懂得，任何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其于历史上得以产生、延续和发展，自有其内在之知识形态与文明根基，这一根基当可因吸收消化外来之先进文明而演变，亦可受外部文化之影响而进步，但总体上说，任何进步之变化而非灭亡之变化，一定是在原有文明之基础上的进步，是在本土文明与外来文明融通之基础上的变化。因为任何社会之进步与发展，终究只得靠其自己人民的努力，而不能由他者代替包办，如若本土文明土